

watch | 上证观察家

两大挑战直逼国有上市银行

中国国有上市银行在多项业绩高奏凯歌的同时,还需保持头脑的清醒,尤其要注意到年报中一些不容乐观的数字,它昭示着国有银行的发展壮大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和变数。国有上市银行一方面需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切实提高信贷质量;另一方面,必须加大中间业务的投入力度,创新金融衍生品,有效控制市场风险。唯如此,才能使国有银行的未来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取得突破,并真正成为强手如林的全球金融业博得一席之地。

□郭田勇 赵晓玲

工行、中行、建行三家已上市的大型国有银行2006年的经营业绩均已呈现眼前。三份年报公布的财务数据着实喜人:工中建三行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498.8亿元、418.92亿元、463.1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高达31.2%、52.38%、18.02%。与此同时,三家银行的资产总额、贷款总额也增长较快,特别是工行资产总额已达751万亿元,规模超过汇丰银行,直逼拥有1.88万亿美元资产的花旗银行。三家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4.05%、13.59%、12.11%,不良贷款率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为3.79%、4.04%、3.29%,已接近发达国家银行业3%左右不良贷款率的水平。此外,三家银行在资产回报率、股东权益回报率、成本对收入比率等指标上均有良好表现。

这些业绩的取得,首先要归功于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几家银行在改制和上市之后,募集了大量资本金使得资本充足率得以大大提升,增强了其抗风险的能力。同时,股改和上市也使得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获得明显提升,这不仅体现在税后利润的大幅增长,也体现在资产质量的明显改善。

当然,也要看到,作为与经济运行层面结合最为紧密的行业,国有银行上好业绩的取得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央行在去年四月底的加息中,出于稳定汇率和扩大消费的目的,只提高了贷款利率而存款利率没动,这显然使银行得到了好处,利息收入大为增加。去年以来,资本市场的持续向好,使银行存款活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有助于税后利润的提高。同时,这也促成了基金、理财、保险等产品的热销,促进了银行在代理类手续费方面的激增。

因此,在多项业绩高奏凯歌的同时,还需保持头脑的清醒,尤其要注意到年报中一些不容乐观的数字,它昭示着国有银行的发展壮大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和变数。

首先,国有银行中间业务的比重仍然偏低。三家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9.14%,建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比率达到8.95%,中行略高,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18.14%。但从国际水平来看,花旗等20多家国际大银行的中间业务比重已超过50%。相比之下,我国国有银行中间业务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我国国有银行

的中间业务模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大多集中在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传统金融产品,如结算业务、代理业务等。当前,随着银行业的全面开放,理财、银行卡、贸易融资、投资咨询管理、私人银行等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银行争夺的焦点。因此,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中间业务创新,开发技术含量高的金融产品,进而增加中间业务占比是我国国有银行实现持续增长的要素之一。

外汇敞口风险是上市国有银行亟须面对的另一问题。三家国有银行均在境外上市,手中持有大量外汇,如何在人民币趋于升值的汇率环境下,最低限度的降低外汇敞口风险成为摆在各家银行面前的严峻考验。以中国银行为例,2006年外汇敞口估值净损失为98.20亿元,而2005年这一损失仅为47.46亿元。值得庆幸的是在外币资金平均收益高于人

民币资金平均收益的基础上,表内的外汇敞口头寸利差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汇敞口的估值损失。让我们来实际计算一下,2006年外币债券平均收益为4.75%,本币债券平均收益率为2.35%,两者利差为2.40%,银行表内外汇敞口为853亿美元,利差收入则为20.47亿美元,弥补了外汇敞口的估值损失。但这种弥补在本币与外币利差逐渐收窄的趋势下将势单力薄,难以持续。从长久来看,避免外汇敞口风险的上策是发展金融衍生品,通过期权、掉期等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锁定汇率风险,这无疑是对国有银行的又一挑战。

因此,我国国有上市银行一方面需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切实提高信贷质量;另一方面,必须加大中间业务的投入力度,创新金融衍生品,有效控制市场风险。唯如此,才能使国有银行的未来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取得突破,并真正成为强手如林的全球金融业博得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大学生就业难 不能忽略自身因素

□姜松

2007年,社会新增岗位约900万个,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约495万人,高校毕业生将首次超过社会新增就业岗位的半数,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直接关系,我国高校在扩招之后,加大了人才供给,但是,这种供给并非有效供给,导致了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即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不能提供,高校提供的人才又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条件。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瑕疵,已经成为影响人才质量的一个瓶颈。从教材的滞后,到专业设置与现实的脱节,再到教学的教条倾向,大学生无法学到实践中真正需要乃至急需的知识。而且,目前许多大学浮躁之气浓郁,不少大学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建当中而不是教学当中,这种主次颠倒的资源配置机制必然影响人才的质量。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大学生自身的因素也非常重。事实上,即使在目前的人才培养机制下,仍有不少大学生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剔除大学生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因素,个人能力在就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恰是在这一点上,大学生的素质无法令人满意。

中国平安保险昆明分公司在“2007首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招聘时,遇到了一位姓陈的母亲带着儿子来,当招聘人员问起小伙子的求职意向、个人情况等问题时,全是母亲滔滔不绝的介绍。招聘方看到母亲冲闹的性格,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这里招收职员,就需要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的。看您能力很强,不如明天来我们公司面试吧。”而此时,陈女士的儿子还未决定好选择哪个职业最合适。

这种反差充分暴露出当今大学生的软肋和缺陷。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与孩子父母的教育有着直接联系。倘若那位能干的母亲不“事必亲躬”,孩子的公关能力至于这么差吗?

在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一般都远远高于社会效益率——这是促使人们愿意在高等教育方面投资的最大动力,而我国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效益率相比,却呈现出下降趋势。倘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社会、学校、家庭都有一定责任,都需要反思。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增就业机会将不断出现,但是,大学生自身素质如何提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CPI逼近警戒线与房价有关

□陈军华

尽管3月份CPI(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还没有公布,但从目前的情况及诸多专家的预测来看,冲破3%“警戒线”的可能性非常大。日益加大的通胀压力,再次让市场各方绷紧加息神经。资本市场甚至以“本月就要加息”的传言予以高调呼应。4月16日,由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央行在调控方面的压力显现,因而,央行仍有可能继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回收流动性,年内也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

自2006年初至今,央行总计已3次上调贷款利率,2次上调基准存款利率。同时,从去年年初至今,央行已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多次召开窗口指导会议,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冲流动性。央行最近一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是自2007年3月18日起将金融机构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52%提高到2.79%;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12%提高到6.39%。

但是,这些措施并无明显效果,除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本身局限之外,还与房价的快速上涨有关。目前,许多人认为房价的上涨与CPI增速之间并无明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0%,涨幅比2月高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涨幅比2月低0.1个百分点,深圳、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依然“名列前茅”。

我们知道,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使得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商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当房价快速上涨,远远偏离商品的价值,就与其他商品价格之间形成了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当房价持续上涨到一定程度,在比价复归力量的作用下,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只有通过上涨才能实现与房价的比价复归。其上涨幅度与房价的涨幅有关,如果房价成倍上涨,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必然以相近的速度和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况下,CPI的上涨其实很难避免,严重的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倘若房价继续保持快速上涨,在比价复归力量的影响下,CPI的上涨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和必然性。应该看到,由于住房在我国GDP权重中所占比例过低,CPI所反映出来的指数存在失真问题,即实际消费价格指数可能高于我们目前所公布的数值。透过这一点更能看清目前CPI增速之快。除非严厉调控,降低房价,否则,单纯使用金融工具很难阻止CPI的上涨。

为什么提醒“见好就收”反而成了“乌鸦嘴”

□周俊生

中国股票市场在今年3月企稳于3000点以后,市场多头气氛空前高涨,昨天已经站稳于3600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轮牛市行情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伴随着大盘不断升涨的整个过程,总是不断地出现看空的言论,近日就有“见好就收”的谆谆告诫见于媒体。但是,市场的现实却使这些说法很快破灭,在网上,甚至有人把提醒“见好就收”的有关人士称为“乌鸦嘴”。

网上写手缺少约束,用语难免有点恣肆,好心提醒投资者“见好就收”,却被讽为“乌鸦嘴”,这有点过份。但如果我们想到,网上言论其实也是民意的一部分,就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善良的愿望,却得不到良好的呼应?而且事实也已证明,如果依着“见好就收”的思路来进行市场操作,就很可能会坐失投资良机。

应该说,提醒“见好就收”的人士,并不是像我们以往见到的一些所谓“黑嘴”一样,利用自己

在市场舆论上的话语权,来对自己的市场操作“抬轿子”,他们真心希望投资者能够将牛市的果实“落袋为安”,避免可能出现的暴跌伤害到自己。但是,这些人士在进行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却犯了一个类似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习惯于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观察现实的市场,习惯于用过往的股市实践来研究未来的市场发展。

凡是熟悉中国股市历史的人都知道,以往虽然出现过几次短暂的牛市行情,但牛市之后的熊市更可怕,其暴跌之惨烈、时间之漫长,让人颇为难忘,其间教训也很深刻。今天我们面对飞速上涨的大盘,昔日的痛苦基本上已经抛到了脑后,但是以往的经历依然是值得我们保存的一笔财富。认真想一想以往出现的几次牛市行情,它们或者是在市场刚起步时在股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出现的“暴发式行情”,或者是在政策强烈助推下出现的“拔苗式行情”,都是在投机势力过于猖獗的情况下出现的“投机式行情”,都缺少基本面的有力配合,因此,这就

注定了它们是短命的,也是充满了风险的。这种缺少基本面配合的“人造牛市”,只能得到比其更为凶狠的熊市的报复。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往几次牛市行情的特点,就可以比较出,这一轮牛市行情与昔日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市场扩大以后,我国的上市公司队伍已经蔚为壮观,大批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支柱作用的大型企业进入市场,成为投资者的投资对象,使股票市场不再与GDP发展相脱离,投资者已经具备了分享GDP成长成果的良好条件。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问题上市公司,要么已经或正在被淘汰出局,要么经过并购等市场运作得到新的发展机遇。伴随着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成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与入市者的增加,一直困扰着市场运行的资金紧张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这种市场基本面的彻底变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全新的格局,如果只是凭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来看待这个全新的市场,那么,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偏差。

当然,市场不可能永远处于

涨势之中,“有涨必有跌”,是一条永远正确的真话。但是,这种下跌,更多地是就个股而言,而且也不是涨了多少就应该跌多少。在以往的市场中,确实出现过整个大盘一齐下跌的情况,但那更多地是在强烈调控下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市场操纵者的作用。随着有关部门在市场管理上的日趋成熟,特别是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目前似乎已经很高的点位上,具体到个股来说,有的可能确实应该“见好就收”,但也有的个股,其投资价值还远没有挖掘出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持仓,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市场分析人士,更应该善于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投资者进行这种判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是笼统地以“有涨必有跌”的教条来看待市场,这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操作。

面对着一个全新格局的市场,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进行认识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尽可能合乎市场实际的分析与判断,受到市场的欢迎。

voice | 上证名记者

加快蓝筹股发行节奏 有利于A股市场稳定发展

□乐嘉春

场的整体投资风险?在笔者看来,只有加快新股尤其是大盘蓝筹股的发行节奏。这样,不仅可以为A股市场提供更为充足的优质上市公司资源,提高A股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即提高盈利能力降低整体市场的市盈率水平),而且也有助于吸纳当前A股市场上过于充沛的流动性,使资金与筹码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某种均衡。由此可见,加快大盘蓝筹股的发行节奏,可以起到维持A股市场长期走“慢牛”的稳定发展趋势。

其次,这将有利于A股指数期货在日后的推出。从目前看,A股市场中各类权重股的比例分布还太不合理。例如,A股金融股所占沪深两市总市值和流通市值的比例分别约为32.92%和12.46%,A股金融股所占沪深300指数的比例约为19.83%。这意味着,只要操纵了A股金融股股价,就可以对A股股指期货的波动产生深度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现在起能加快大盘蓝筹股的发行节奏,尤其是增加非金融类蓝筹股的市场比例,如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电信等大批蓝筹股加速回归A股市场,这样做就可以改善目前A股各类指数中权重股所属行业的比例失调问题,使得A股各类指数(尤其是上证综指)不再那么容易被市场操纵。

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快发行

大盘蓝筹股的市场节奏,将有助于平衡A股各类型指数中权重股的比例,这对于日后平稳推出A股指数期货是有非常突出意义的。

笔者认为,在这项工作未完成之前,贸然推出A股股指期货是不适当的。由此预期,A股股指期货的推出日期将被推迟。

鉴于此,加快大盘蓝筹股的发行节奏,已成为目前稳定A股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也应当成为一种市场共识。

那么,如何化解目前A股市

美元,中国某石油巨头的纯利就将减少5%。相关利益集体的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我认为,资源税改革最重要的还不是税率问题,而是资源税的征收方式问题。按照《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目前,我国征收资源税所依据的是产量和销售量,实行定额税率,即从量定额征收。这是导致我国资源浪费严重根本原因之一。相关数据表明,全国煤矿平均资源回采率约40%,资源富集地区小煤窑资源回采率仅为15%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座储量为1000万吨的煤矿,仅开采了150万吨就被废弃。自建国以来至2003年,中国累计产煤约350亿吨,煤炭资源消耗量超过1000亿吨,我们至少扔掉了650亿吨的煤炭资源。

资源税属于共享税,在其分配中,中央拿大头,只给地方留下25%。这种分配机制许多地方不满意,因为,资源税的征收主要依靠属地资源,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治理,也需要对受损的当地居民进行补偿,过低的资源税显然不利于补偿的进行。

因此,有人在《新京报》撰文指出:“要想保障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要解决好收入归属问题。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中央分享小部分,地方分享大部分,这个比例最低应是四六开(也就是中央要40%,地方要60%)。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资源税返还给地方的财政资金,建立一套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作为农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补偿。”

这一观点可行性很大,同时,笔者认为,给地方的比例还可以再大一些,以便地方政府尽快建立起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避免环境的恶化,并补偿当地居民因资源开发受到的损失。我国许多资源都集中在西南、西北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而许多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将资源税留在地方,有利于缩小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资源税改革利益博弈的另一个问题是税率的提高问题,资源所属地区希望资源税大幅度提高,而许多既得利益集体则反对资源税提高过快。以石油资源税为例,我国每吨仅30元,只相当于美国标准(每吨130美元)的1/34。投资银行瑞士信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如果资源税每桶原油征收1